



“任克溥登岱题诗”摩崖石刻（左）。 本人供图

泰山“任克溥登岱题诗” 摩崖石刻考释

□柏勋晨

“任克溥登岱题诗”摩崖石刻位于泰山景区南天门管理区朝阳洞北侧的山崖石壁上。其具体方位可以“处士松”题刻为参照物，向北延伸50米左右。该区域正好处于泰山中轴线主道东侧，海拔约1100米，属岱顶核心景观带。朝阳洞是明代始建的天然洞穴建筑群，由此向北经“处士松”至石刻所在位置，构成自红门至玉皇顶传统登山路线的重要节点。此处山势陡峭，岩壁呈灰白色花岗岩质，周边植被以泰山松为主，具有自然景观与人文遗迹交融的典型泰山地貌特征。

“任克溥登岱题诗”摩崖石刻主要采用传统阴刻技法，刻工为平底处理。石刻整体呈竖式长方形布局，字面实测高度198厘米、宽度94厘米。主体诗文分5列镌刻，字径统一为12厘米。诗文内容完整保留，共56字：

“岩气气象岱宗开，五岳首推信壮哉。

势接沧溟藏雨露，形连霄汉起风雷。

千丛脉秀龙鳞树，万丈骨高虎卧台。

策杖重游堪纵目，盘桓懒去问蓬莱。”

落款位于诗文左下方，单行镌

刻“甲戌暮春东昌任克溥题书”11字，字径缩减为10厘米。经仔细研究发现，该石刻整体书法为典型清代馆阁体楷书，结体方正，笔画平直，起收笔处可见明显顿挫痕迹。刻痕深度约2至3厘米，历经300余年风雨侵蚀，除局部边缘有轻微剥落后，主体文字保存完整。石刻周边无装饰纹样，仅在右上角留有自然岩层肌理。

石刻上所提“甲戌年”是清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题刻者任克溥是山东东昌府（今聊城）人，顺治四年（1647年）进士，官至刑部左侍郎。为官期间，他曾多次上疏减赋、惩贪、禁奢等事项，言别人所不敢言，是一位直言敢谏的大臣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任克溥返乡，开始了怡然自得的赋闲生活。一生中，他曾多次游历泰山。此次题诗系其重游泰山所作，距离其首次登岱已逾40年。

另外，石刻所在岩壁原为明代文人题刻聚集区，清初因战乱多有损毁。清代康熙年间随着政局逐步稳定，泰山的文化活动才得以复苏，官员题刻数量激增。任克溥作为清朝致仕高官，其题刻具有示范效应，带动了很多同期官员效仿。清代《泰山志》卷十六“金石

记”对此石刻有简要著录，民国时期《泰山石刻志》补充记录了具体尺寸。1982年，该石刻被纳入泰山摩崖石刻保护名录。

该石刻研究价值极高。首先，它是研究清初士大夫政治心态的重要实物。任克溥历经明清鼎革，其“策杖重游”的记载印证了康熙中期汉族士绅与清政权的关系缓和。诗中“盘桓懒去问蓬莱”的表述，既延续了传统泰山诗文的神仙意象，又暗含对现实政治的认可，反映了明遗民群体在康熙盛世的文化转向。其次，在文学艺术价值方面，诗文采用七言律诗格式，严格遵循平仄对仗，前三联着力描绘泰山雄姿，尾联转入人生感悟，结构严谨。“龙鳞树”与“虎卧台”的意象组合，既写实描绘了泰山松的鳞状树皮和天然石台，又暗喻儒家“龙虎气象”的政治理想，体现了清初理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，规整的楷体也与康乾时期官方文书风格一致，是研究清代馆阁体演变的重要样本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，在当时那个科学落后的年代，诗中“势接沧溟”“形连霄汉”的表述，准确反映了泰山的地理特征。东望黄海、北

瞰华北平原的视野描述，与石刻所在海拔高度（约1100米）和朝向（东南）完全吻合，证明清代文人对泰山地理已有科学认知。这种将实地观察融入文学创作的手法，打破了传统山水诗的程式化倾向。

最后，该石刻还延续了泰山“以山为纸”的文化传统。自秦汉至明清，泰山现存石刻1800余处，任克溥题诗正处于清初石刻高峰期。其内容上承杜甫《望岳》的雄浑气象，下启乾隆“御制诗”的皇家气派，在泰山诗文体系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节点意义。2019年泰山文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，该石刻是朝阳洞区域游客停留时间最长的文化景观之一，发挥着传统文化的传播功能。

“任克溥登岱题诗”摩崖石刻作为清代泰山文化的典型遗存，其价值超越单一艺术作品范畴。从物质形态看，它记录了清初石刻工艺的技术标准；从历史脉络看，它见证了士大夫群体的心态变迁；从文化传承看，它延续了泰山作为精神象征的永恒魅力。这种多维度的价值叠加，正是泰山文化遗产独特性的集中体现。对其进行持续研究，将为理解我国山岳文化提供新的学术视角。

